

論康有為教育思想的宗旨、特色與分期*

魏義霞

[提要] 康有為既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又是近代著名的公羊學大師；前者表明他是政治家或稱戊戌啟蒙思想家，後者表明他是國學家或稱中學家。這就是說，康有為具有多重身份，集政治家、戊戌啟蒙思想家、公羊學家和國學家於一身。除此之外，康有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身份——教育家。梁啟超甚至認為，康有為最主要的身份不是哲學家或政治家而是教育家。無論這種評價準確與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教育家身份對於康有為非常重要，教育思想在康有為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故而不可或缺。事實上，教育思想不僅是康有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與他的哲學觀念、政治主張、理論側重和思想嬗變一脈相承。因此，深入領悟其教育思想的宗旨、特色和分期，不僅有助於全面把握康有為思想的整體性與階段性，而且有助於直觀感受其思想的原創性和獨特性。

[關鍵詞] 康有為 教育思想 宗旨 特色 四個分期

[中圖分類號] G40-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3 - 0096 - 09

康有為在中國近代的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集多重身份於一身——在政治上是戊戌變法的領袖，在學術上是著名的公羊學巨擘，有人甚至將他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公羊學大師。戊戌變法的領袖表明，康有為是政治家，側重從政治或啟蒙思想的角度立論；公羊學大師表明，他是學問家，側重從學術或堅守國學的角度立論。事實上，對於康有為來說，政治與學術不惟不相衝突或矛盾，反而互為表裡，相得益彰：學術支持了政治，為變法維新和立孔教為國教提供輿論支持和理論辯護；政治貫徹了學術，使學術主張和思想訴求落實到具體操作乃至得以實施。不僅如此，除了政治家、戊戌啟蒙思想家、公羊學家和國學家等多種身份之外，康有為還是成績卓著的教育家。康有為最得意的弟子——梁啟超指出，康有為是中國亙古未有的宗教家和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甚至認為康有為最主要的身份不是哲學家或政治家，而是教育家。一方面，作為教育家的康有為既有完備的教育理念和獨特的教育方針，又有豐富的教學實踐和驕人的教學成果。另一方面，康有

* 本文係岳麓書院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 2013 年國學招標項目“康有為國學研究”（項目號：13YBA373）的階段性成果。

為是近代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政治家、戊戌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家和公羊學家，多種身份給他的教育思想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如果說戊戌啟蒙思想家的身份決定了康有為的教育理念緊扣時代脈搏，圍繞著救亡圖存與思想啟蒙的時代呼喚和歷史使命展開的話，那麼，哲學家的素養和宗教家的訴求則使他對教育問題的探討極富形上意蘊和人文關懷。與此同時，公羊學家的身份使他自覺不自覺地將發揮微言大義運用到對未來的暢想之中，提出的教育理念和主張極富個性風采和思想特質。當然，無論是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哲學思想還是宗教旨歸的變化，都影響到他的教育思想，致使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最終形成了四個涇渭分明的不同階段。

—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精神領袖，集政治家、戊戌啟蒙思想家、公羊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於一身。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促使他形成了獨特的教育理念，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內容和特色。正因為如此，作為康有為思想的組成部分，教育思想帶有濃郁的康記色彩，具有與其他思想一樣的理論來源和初衷。只有瞭解康有為整個思想的歷史背景、文化語境、立言宗旨和理論來源，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他的教育思想。

康有為之所以對教育極為重視，是因為在對中國落後挨打的分析中深切認識到了人才的作用，並將人才匱乏說成是中國之患，而將“教學不修”歸結為國無人才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寫道：“朝無才臣，學無才士，閫無才將，伍無才卒，野無才農，府無才匠，市無才商，則國弱。……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惡為不修？患其不師古也。今天下禮制、訓誥、文詞皆尚古，惡為不師古？曰：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義也。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稱朱子，明教學之分，別師儒官學之條，舉‘六藝’之意，統而貫之，條而理之，復古復始，創法立制。”^①在這裡，康有為將中國落後、貧困、衰微之根源統統歸結為人才匱乏，並且進一步將人才匱乏歸咎於“教學不修”。這一認定將矛頭指向當時的教育，也從反面彰顯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基於這一分析，他將中國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的希望寄託於教育。

伴隨著對教育功能的凸顯，康有為在戊戌維新之前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創辦學校、興辦教育以及培養人才的教育實踐之中。在此期間，他利用各種形式開展辦學、講學活動。對於康有為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梁啟超介紹說：“先生（指康有為——引者注）以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②對於甲午海戰的失敗，康有為同樣從中國的教育不如日本中尋找原因。這使他一如既往地大聲疾呼發展教育，戊戌維新時期更是利用上奏皇帝的方便條件反復奏疏教育問題。即便是暢想千百萬年之後的未來社會，《大同書》中同樣對教育格外重視。到了晚年，康有為更是“重操舊業”，再一次辦學授課。1926年——也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康有為在上海開辦天遊學院。第一批註冊學員僅20人，後來人數增加到90人。儘管如此，這一數字仍然無法與早年萬木草堂相比。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以講學“開場”、以講學“收場”的人生軌跡似乎印證了康有為與教育解不開的情緣。

由於個人經歷、學術興趣和政治主張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康有為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既帶有中國近代的時代風韻而呈現出與其他近代哲學家的一致性；又個性飛揚，擁有迥異於他人的鮮明特色：前者表現為呼籲教育改革，在主張廢八股、變科舉的同時，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和辦學經驗；後者表現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使用教育而是熱衷於教之概念，並且由於教之概念的泛化而教學

相混。由於對教育、教化與宗教未作明確釐定，教育與宗教在康有為那裡是相混的。這使他的教育思想在概念上模糊不清，在內容上廣博龐雜，在觀念上新舊交替，因而成為近代思想史上的獨特景觀。

儘管康有為本人並沒有專門的教育著作流傳於世，然而，他的講學內容卻被眾多弟子記錄下來得以保留，名為《南海先生講學記》、《萬木草堂口說》和《南海師承記》等，成為研究康有為教育思想不可多得的原始文本。這些均被收入現存的《康有為全集》之中，《萬木草堂口說》等更是有多種版本流傳於世。此外，康有為的眾多弟子曾經先後為康有為作傳，由此出現了“南海三傳”，即梁啟超撰寫的《南海康先生傳》、陸乃翔和陸敦騷合撰的《南海先生傳》和張伯楨撰寫的《南海康先生傳》。這些人在傳中不約而同地介紹乃至隆重推出康有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學內容和教育成就，致使“南海三傳”為研究康有為的教學理念、教學內容和實踐提供了鮮活的資料。梁啟超的《南海康先生傳》完成於1901年，陸乃翔和陸敦騷的《南海先生傳》寫作於1929年，張伯楨的《南海康先生傳》定稿於1932年；三者之間在時間上相隔30餘年，這一時間差也從一個側面絕好地展示了康有為哲學理念和教育主張的變化軌跡。

更為重要的是，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前後的奏摺中多次提到教育問題。例如，僅在1898年6月1日至7月6日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有《請正定四書文體以勵實學而取真才摺》、《請譯日本書片》、《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時務需才請開館譯書以宏造就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請變通科舉改八股為策論摺》、《經濟特科以得通才為主片》、《請將盛宣懷借戶部款歲息撥充學堂經費片》、《請商定教案法律釐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謹寫〈孔子改制考〉進呈御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摺》、《請廢八股以育人才摺》、《請以爵賞獎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新學設立特許專賣摺》、《請將經濟歲舉歸併正科並飭各省生童歲科試迅即遵旨改試策論摺》、《請禁奏請複用八股試士片》、《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請開學校片》、《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摺》、《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片》和《祈酌定各項考試策論文體摺》等奏摺奏疏教育問題，此外還有《請開農學堂地質局以興農殖民而富國本摺》等等。這些奏摺反映了康有為對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視，其中蘊含著他的哲學理念和教育主張。由於許多奏摺是專門就教育問題上書的，名為“奏摺”，實則不啻為闡發教育的專題論文，因而成為研究康有為教育思想——特別是教育改革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大同書》中明確指出大同社會最重教化，並且對未來教育進行全球規劃，建構了一套完整的20年義務教育方案。雖然醞釀於1884年，《大同書》卻成書於1901～1902年間，也就是康有為遊歷歐美各洲和印度之後。這恰好代表了他第三階段的教育主張。與《大同書》命運相似的《諸天講》^⑨同樣寄託了康有為的教育理念，《諸天講》與《大同書》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康有為唯一一部生前未付梓的著作，而且在於《諸天講》原本就是他晚年在天遊學院講課的講稿，這與《大同書》“秘不示人”、不對學生宣講形成了強烈對比。當然，兩書的內容也有本質區別。正是這種區別將《大同書》鎖定在了第三時期，而《諸天講》則屬於第四時期。當然，說到講稿，不能不提康有為早期講學時講授、並由弟子們參與整理、編撰完成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因此，這兩部書既是康有為的學術著作，又是他講課的“教材”。作為“教材”，《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真實呈現了康有為的講學內容，書中秉持公羊學傳統發揮的微言大義和託古改制思想恰好印證了他的教育思想與啟蒙思想、政治主張和國學理念的密不可分。

二

在康有為的意識中，如果說教育與國家強弱的如影隨形預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離不開教育的話，那麼，中日甲午海戰以及中國的戰敗則使效仿德國、日本的教育模式，引進新式教育體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正如戊戌啟蒙思潮正式走向中國歷史前台的導火索是中國在甲午海戰中的失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一樣，包括康有為在內的戊戌啟蒙思想家試圖通過剖析中國戰敗的根源，探究癡愚振衰起弱的救亡之方和啟蒙之策。面對中國在甲午海戰中的失敗，與嚴復著眼於中國與西方的自由之差、梁啟超認定缺乏愛國心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相去甚遠，康有為強調教育的失敗對此難辭其咎。1898年，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摺》中更是將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戰勝中國的原因歸結為教育的成功，以此凸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教育差距，並用這一差距來解釋中國的戰敗。於是，他寫道：“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慶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育成之矣。”^④通過對比日本與中國的教育狀況，康有為一面尋找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教育方面的差距，一面反思中國近代的積貧積弱和落後挨打，最終將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歸結為由於缺乏“窮理勸學”而人才短缺。沿著這一思路，他將拯救中國的希望寄託於推行教育改良，大力發展教育。

康有為多次表白，自己是為了救世而來，從他無論是弘揚孔教還是興辦教育都是為了救亡圖存這個總目標來看，康有為此言不虛。在寫給沈子培的信中，康有為如是坦陳自己的生平志向和為學宗旨：“今者僕將歸耕，將欲忘斯世而寄其情，則無可用心者。為文詞，則巧言以奪志；為考據，則瑣碎而破道；為天文，則無三十五萬金所築之高臺，二十五萬金所購之千里鏡，無一時精敏之士相與各考一星，則天學必不成；為地輿，則足跡不能遍行地球以測繪之，財力不能遍購地圖以參核之，則地學必不精。至於耕而不講農學，則未通土化之法，不能辨諸土所含物質之異同輕重，草木所含物質之多少清濃以調劑之。泰西農學書院、公會四百餘，農具機器三千餘，農書萬餘種矣，彼合十數國相與謀之，一日之耕能三百餘畝，撒種刈禾能百餘畝矣。吾與君即欲講求，是不過取《農政全書》考求之，以餬余口，尚慮不足，豈復成學，以銷磨其壯心，如老僧之念佛而已？然不能為佛氏之降伏其心，老氏之弱其志，不忍人之心橫決驟發，我無土地，無人民，無統緒，無事權，為之奈何？或者其託於教乎？……若夫教，何以為教哉？有高有下，有淺有深，因人而發，要足以救今之弊，興起人心，成就人才而已。”^⑤在這番自我表白中，康有為從志向、財力和學識等各方面進行自我評估，得出的鑒定結論是，自己最適宜從事教育（“講求”）。這就是說，鑒於對自身處境和能力的綜合考量，他認定自己能為“救今之弊”所做的是興辦教育。據此可知，康有為之所以將精力投注到教育（“講求”）之中，是為了“救今之弊”；而教育之所以有此功效，是因為他確信教育可以鼓舞人心，培養人才。

對於康有為來說，確立了鼓舞人心、培養人才的教育宗旨，也就大致框定了具體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於是，他寫道：“僕謂教者猶醫者然，因其病而已。今之學者，利祿之卑鄙為內傷，深入膏肓，而考據、詞章則其癰疽痔贅也。必在明其本心，使從死生利害打破，令其緇軒冕而泥金玉，蹈厲發揚，人人有天人之思，而後浸以‘六經’諸儒之大義，通以‘九通’、‘全史’之掌故，深以造化物理之消息，其或有所補已。僕最愛佛氏入門有發誓堅信之說，峭聳精緊，世變大，則教亦異，不復能拘常守舊，惟是正之。”^⑥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對康有為教育理

念和方法的介紹印證了康有為的上述這番自我表白。在康有為看來，名師與神醫是相通的，因為教師教學與醫生治病是一個道理，訣竅就在於因病施救、對症下藥。而他對當時學風的判斷是，功名利祿之心傷乎內，是“內傷”；這一“內傷”成乎外，生成的“外傷”便是考據、詞章之癰疽痔贅。針對中國教育的這一病灶和表現，康有為開出的施治診斷和醫治措施分兩步走：第一步，在教學中注重澄明本心，打破生死利害之念，引導學生視高官厚祿、金銀貨利為糞土，這屬於德育，解決的是人生追求和道德境界問題；第二步，在從思想上解決了動機問題之後，再在教學內容上教以六經之大義和“九通”、“全史”之掌故，這屬於智育，解決的是智力開發和知識增長問題。由此可見，他的教育理念重心在於志氣的培養，而不是將知識的灌輸置於首位。對於這一點，康有為所講的“最愛”佛教入門的“發誓堅信”便是明證。進而言之，康有為之所以這樣安排教育的順序和比重，目的是為了打破人的生死利害之念，引導人擺脫聲色犬馬的羈絆。秉持這一教學方針，他在教學過程中著重解決德性、境界問題而非智力、認知問題。這也是梁啟超評價康有為的教學內容德育佔十分之七，智育佔十分之三的依據或原因。

梁啟超評價康有為是理想家，康有為的教育理念和主張為這一評價提供了最好的注腳。如果說廢八股、變科舉等主張是康有為面對現實，圍繞著救亡圖存與思想啟蒙的歷史使命、時代呼喚和社會需要作出的回應，故而屬於權宜之計的話，那麼，他關於教育還有未來的理想建構和無限遐想。如果說《大同書》集中體現了康有為對未來教育的理想建構的話，那麼，《諸天講》則寄託了他對未來教育的無限遐想。

三

康有為在戊戌啟蒙四大家中是最長壽的，加之那個時代風雲變幻、新學迭出，他的哲學主張、理論熱點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側重，彼此之間呈現出巨大反差。大致說來，在戊戌維新前的十多年間，康有為熱衷於考辨中國本土文化的“學術源流”；從1895年“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失敗的戊戌變法時期，則致力於政治運動和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維新失敗逃亡日本——尤其是遊歷歐美各洲之後公開反對自由、平等，儘管他此時的思想啟蒙鋒芒不再，卻依然秉持立孔教為國教的立場；回國後特別是在晚年則放棄孔教立場，伴隨著對莊子、道教思想的興趣盎然，寄情於天遊，直到去世一直對“天遊之學”情有獨鍾。不同的哲學主張和理論重心表明，康有為在不同時期擁有不同的關注話題和學術重點，由此構成了他獨特的思想嬗變和心路歷程。

與不同的哲學理念、學術重點、關注話題和價值訴求相對應，康有為的教育思想呈現出涇渭分明的階段特徵，可以分為四個不同時期：第一時期是以萬木草堂為代表的學術研究和收徒講學時期。在1895年“公車上書”之前的十多年間，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長興學舍，培養了以梁啟超和陳千秋為翹楚的一大批弟子——既貫徹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又為變法維新儲備了優秀人才。有鑑於此，這一時期無論對於康有為的教育思想還是政治思想都至關重要。梁啟超稱康有為的第一身份不是哲學家——甚至不是政治家而是教育家，顯然就是針對這個時期立論的。第二時期是以“公車上書”、“百日維新”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時期。在此期間，康有為的主要精力是向光緒帝奏疏變法維新的具體規劃和設想，其中包括教育改革，主要方式和渠道是通過奏摺上書皇帝，對改變科舉制度、創辦新式學堂獻計獻策。第三時期是戊戌政變失敗後流亡海外的考察、反思時期。在此期間，他熱衷於對日本特別是歐美各國的教育狀況進行考察、對比和思考，隨著關注重點的轉移，對西學的態度也發生巨大逆轉。這集中表現為不再像戊戌維新時期那樣力主教育

改良，甚至不再只關心中國的教育現狀，而是對全世界的未來之教育進行整體設計和全球規劃。第四時期是晚年的教育暢想時期。在此期間，康有為由於對保皇的心灰意冷而遠離政治鬥爭，甚至忘卻了曾經奔走呼號的立孔教為國教和救亡圖存。政治上百無聊賴的他專注於對諸天的暢想，在“見大則心泰”中尋求個人的逍遙快樂。當然，康有為以教學的方式將自己對天遊的樂此不疲傳授給他人，也在經過了引進西方教育模式、為全世界教育進行籌劃之後，復歸於收徒講學。

上述梳理顯示，康有為在不同階段面對的教育對象大相徑庭：第一時期是老師對學生，教育對象基本上限於他講學招收的弟子，最多也不過是前來的“慕課”者；第二時期是啟蒙思想家對被啟蒙的國民，教育對象是全體中國人；第三時期是大醫對受病者，教育對象是地球上包括中國與西方列強在內的陷入苦海的芸芸眾生；第四時期是教主對人類，教育對象是包括地球人在內的諸天上的全人類。由此不難想像，既然四個時期的教育對象差若雲泥，那麼，面對不同教育對象的康有為便隨之擁有了不同的身份：第一時期是特定教師，面對的是有限的特定學生；第二時期是國民導師，面對的是亟待啟蒙、有待提高素質的全體中國人；第三時期是地球拯救者，面對的是地球人；第四時期是宇宙超人或教皇，面對的是包括地球在內的諸天之人。這就是說，康有為在不同時期擁有不同的教育主體資格和身份，所面對的則是不同的受教對象。當然，與康有為所擁有的教育主體身份和所面對的教育對象相對應，他在各個時期所講授的教學內容迥異其趣。

第一時期，康有為面對專門學生，身為公羊學大師的他作為研究學問的專門教師講授“專業”知識，這主要包括諸子學、宋明學和歷史學等。大致說來，康有為此時的教學內容與他秉持的公羊學立場一脈相承，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講述中國本土文化的“學術源流”。通過對“學術源流”的考辨，康有為旨在講明一個核心問題：“‘六經’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學。”^①這句話表面上說，《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組成的六經都是孔子所作，諸子都是孔子後學，百家可以歸結為孔子之學一家；其中隱藏的深意則是，孔子是中國的教主，既是宗教家，又是教育家。出於對孔子的頂禮膜拜，康有為在這一時期熱衷於發揮孔子的微言大義——無論哲學觀點還是政治主張都是以孔子的名義發出的。與此互為表裡，康有為講課的內容以辨梳孔子與諸子百家的關係為核心話題。他這一時期的講學內容被弟子們記錄下來，成為研究康有為講學內容以及哲學理念、政治觀點的絕佳素材。此外，康有為弟子們撰寫的“南海三傳”都用大量篇幅介紹、評價了康有為的辦學過程、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針，也是研究康有為第一時期教育思想的難得資料。

第二時期，康有為對上鼓動光緒帝變法維新，對下提高國民素質。此時的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奔走呼號，其中包括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模式，輸入西學；翻譯西方的思想，學習外語，直接向各國派遣留學生等。顯而易見，康有為在第二時期無論視闕還是態度都與第一時期具有本質區別，其中的最大區別是不再回顧中國的“學術源流”，而是將目光投向西方，主要以“西學家”、“啟蒙思想家”而非第一時期的中學家、公羊學家的面目示人。就所使用的概念而言，如果說第一時期以教為核心範疇的話，那麼，第二時期則直接使用作為舶來品的教育一詞。就教育的內容來說，不再以諸子學、宋明學構成的中學為主體，而是以日本翻譯的西學為主要內容。《日本書目志》成書於1898年春，生動地再現了康有為此時的思想轉變。《日本書目志》中收錄的學科共十五門，“教育門”赫然在列。“日本書目志總目”不僅具體記載了十五門學科之名，而且排列如下：“生理門第一”，“理學門第二”，“宗教門第三”，“圖史門第四”，“政治門第五”，“法律門第六”，“農業門第七”，“工

業門第八”，“商業門第九”，“教育門第十”，“文學門第十一”，“文字語言門第十二”，“美術門第十三”，“小說門第十四”，“兵書門第十五”。^⑧由此可見，教育與宗教不再像第一時期那樣由於同時包含在教之概念之中而渾然未分——不僅是分開的，而且是各不相涉的並列關係。不僅如此，在相互獨立的十五大學科中，宗教列在第三，教育排在第十，二者中間夾雜了政治、法律、農業、工業和商業等六大學科。這流露出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在此時的康有為看來，宗教與教育涇渭分明，並非屬於同一學科，甚至並無交叉或密切關係。儘管如此，在他的表述中，教之概念卻將二者合而論之，因為康有為所使用的教之概念兼教育與宗教之義。這個做法既體現了康有為思想新舊交替的性質，又暴露出他的思想以及表述的含糊性和不準確性。對於十五門學科，康有為大都在具體書日之前有一個界定，旨在釐清這一學科的內涵和宗旨。對於“教育門”，他卻沒有這麼做。這一“反常”舉動倒並非一定表示康有為對“教育門”不重視，也可能恰好相反，因為對教育格外重視，致使“教育門”所列書目內容太多，故而不好概括。這一猜測可以通過他在“教育門”中所列書目的數量得到印證。在“教育門”中，康有為臚列出十六類圖書，分別是：“道德修身學”、“格言集類”、“勅語書”、“教訓教草修身雜書類”、“修身書小學校用”、“言行錄”、“禮法書”、“教育學書”、“實地教育”、“幼稚女學”、“小學讀本掛圖”、“報告書、教育歷史”、“教育雜書”、“小學讀本（中學讀本附）”、“少年教育書”和“漢文書（教育小說附）”^⑨。在他臚列的這些教育書目中，除了中國近代普遍關注的兒童教育、女學之外，還有“教育小說”。《日本書目志》是康有為從日本轉譯西學的書目單，從中可以發現，孔子已經不是主流。康有為此時的教育思想以日本為主要效仿對象，除了《日本書目志》之外，此時奏摺多次提議效仿日本的教育模式，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等等。康有為在第二時期對日本的亦步亦趨與他在第三時期考察歐美各洲之後堅決抵制日本譯名形成強烈對比。康有為第二時期教育思想的研究資料主要是《日本書目志》和“百日維新”期間的各種奏摺。

第三時期，康有為先是流亡日本，後來遊歷歐美多個國家，考察、瞭解世界各國的文明、文化和教育狀況，並接觸到各種思想學說。這時的他不再像前兩個時期那樣將視線聚焦中國，教育理念也隨之既不像第一時期那樣專注於孔教代表的中學，也不像第二時期那樣熱情學習西方；而是一面對中西文明、教化進行比較，一面雜糅中西古今。可以看到，康有為在這一時期名義上雖然依舊堅持立孔教（儒教）為國教，但是，實質上對孔教的熱情已經銳減。《大同書》一句“岸已登矣，筏亦當捨”^⑩更是將他對孔教的決絕態度推向了極致，也是康有為此時內心的真情流露。當然，他在這一時期所講的教育不再以西學為主，甚至絕口不提第二時期津津樂道的教育改革。正如康有為一再表示未考察之前對西方羨慕不已，考察之後覺得不過爾爾一樣，此時的他認定西方的教化程度遠不如中國，從而對西方的文明大失所望。第三時期的代表作是以《英國遊記》、《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歐美學校圖記》、《法蘭西遊記》、《瑞士遊記》、《希臘遊記》為代表的一大批遊記和《物質救國論》、《大同書》等論作。

第四時期，康有為將視線由地球轉向諸天，目的是將地球之人超度到諸天之上，徹底擺脫煩惱，以確保人之生與樂俱來。不難發現，此時的康有為視線已經不在地球上，而是將目光轉到地球之外的諸天。伴隨著這一轉變，他將主要精力用於講述諸天之大、諸天之多，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則是引導人不做家人、國民、地人而做天人、天上人和天上之人。《諸天講》既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也是他講課的講稿。

四個時期共同組成了康有為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基本主張，也直觀展示出他的教育理念

中西和合、新舊交替的多變性和複雜性。正因為如此，康有為的教育思想由於緊扣中國近代救亡圖存與思想啟蒙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使命呈現出與同時代人的一致性，又由於學術素養、個人意趣而呈現出迥異於同時代人的鮮明特色。

四

康有為的教育理念和主張肩負著救亡圖存與思想啟蒙的雙重歷史使命，這對於四個時期是相同的，在不同時期卻有不同側重和體現：如果說第一時期大聲疾呼立孔教為國教是為了服務於通過保教來保國保種的救亡路線，凸顯的是救亡圖存的主題的話，那麼，第二時期則在甲午海戰的慘敗中認識到了學習西方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在將主要精力和重點轉向變法維新的同時，力主教育改革，思想啟蒙的主題也隨之躍居首位。儘管如此，他第二時期的思想包括教育改革在內歸根結底是為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從這個維度看，康有為教育思想的救亡主旨並沒有變，變的只是方式方法而已。從第三時期開始，康有為在著力中西比較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淡化了思想啟蒙的主題，這集中表現為聲稱孔教高於耶教，中學早於、優於西學而沒有了戊戌維新時期對西學的如饑似渴。至於救亡圖存的宗旨，則在第三時期的思想中呈現出巨大反差乃至矛盾：一方面，他進行中西比較旨在強調孔教是中國的國教，肯定孔教高於西方之教有反對崇洋媚外，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之意——從這個角度看，康有為並沒有放棄救亡圖存的宗旨。另一方面，《大同書》公開呼籲取消國界、同一人種、同一語言文字，這套方案的具體辦法則是用白種人同化作為中國人的黃種人，以西方的字母文字取代中國的象形文字——從這個角度看，康有為最終迷失在世界主義、大同主義之中，喪失了中國的民族性，也背離了救亡圖存的主題。更有甚者，《大同書》將國家與家庭一起說成是人的痛苦根源和快樂羈絆，並由此公開勸導人不做“國民”而做“天民”。至此，康有為的教育理念開始與救亡圖存的宗旨和主題背道而馳，也與前兩個時期培養國民、拯救中華的初衷發生大逆轉。到了第四時期，他專注於引導人放棄地球而做天遊，鼓動人不做地人而做天人，不做地球人而做天上人。至此，康有為的思想不僅與救亡圖存的宗旨南轅北轍，而且與思想啟蒙漸行漸遠。

進而言之，康有為的教育理念和主張在四個時期之所以與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呈現出變動而複雜的關係，與中國近代政治局勢的風譎雲詭密不可分，最根本的原因則受制於他本人在不同時期的政治際遇、學術好惡、志向意趣和價值訴求。就個人的政治際遇而言，第一時期在廣東的“偏於一隅”、教學謀生，第二時期在北京這一權力、政治中心的官場得意、出入廟堂，第三時期在國外的蓄勢待發、圖謀未來，第四時期蟄居上海、青島以及杭州等“溫柔之鄉”的心灰意冷、門前冷落，康有為的人生經歷可謂大起大落，充滿傳奇。這些投射到教育思想中，便有了四個階段的分期。就哲學意趣和思想主體而言，同樣可以歸結為四個階段：戊戌維新之前的第一時期以孔教代表的儒學為主，兼採諸子百家。戊戌維新的第二時期以西學為主，兼採中學。遊歷歐美各洲的第三時期以佛學為主，雜糅古今中西之學。晚年的第四時期以道教和莊子思想為主，和合佛教、基督教代表的宗教與天文學、牛頓力學和達爾文進化論代表的自然科學。與政治際遇和學術思想的四個階段互為表裡且一一對應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呈現出四個涇渭分明的階段。

與此同時，康有為教育思想的階段性與他的人生經歷、心理狀態和思想嬗變一脈相承：早年的康有為作為一介布衣，胸懷救國之志卻無法施展，最後的選擇是興辦教育，故而將希望寄託在授徒講學上。戊戌時期的康有為政治得意，宏大抱負得以施展，因而不滿於講學。於是，身

為光緒帝“新政”大臣的他對教育的重視由早年的辦學講學轉變為對整個中國教育現狀的思考，教育改革由此成為“百日維新”的重要內容。戊戌維新的失敗既打碎了康有為依靠光緒帝推行變法、改革教育的夢想，又使他由於逃亡國外而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西方學說。特別是在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文化情況之後，他對西方、西學的態度由第二時期的羨慕轉向反思。作為政治失意和思想轉變的結果，這一時期的康有為沒有了“百日維新”期間力主改革的躊躇滿志。《大同書》徘徊於現實與理想之間，緣於對中西、古今的糾結。如果說面對革命派的興起和論戰，康有為尚可以負隅頑抗的話，那麼，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則使步入耄耋之年的康有為越來越有被歷史洪流拋棄之感，張勳復辟的曇花一現更是讓他深切感受到了螳臂當車的滋味。於是，通過“見大則心泰”而遺世逍遙便成為康有為第四時期的全部寄託，《諸天講》便是他這一時期的心靈獨白和最後慰藉。事實上，除了《諸天講》之外，暢遊諸天也是他這一時期作詩抒懷的主題。從中不難發現，對於此時的康有為來說，已經百無聊賴，一心嚮往天遊。

①《教學通義·記》，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頁。

②《南海康先生傳》，梁啟超撰，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83頁。

③兩書都歷時數十載，經多次修改而最終定稿，且都是對未來的暢想，而含有虛構成分或科幻色彩等。

④《請開學校奏》，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6頁。

⑤⑥《與沈刑部子培書》，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一集），第238頁。

⑦《萬木草堂口說·學術源流》，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頁。

⑧《日本書目志總目》，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4～265頁。

⑨《日本書目志》卷十目錄，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第394～395頁。

⑩康有為：《大同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5頁。

作者簡介：魏義霞，黑龍江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岳麓書院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兼職研究員。哈爾濱 150080

[責任編輯 陳志雄]